

跑至学校打电话。电话不通即派人到街上去打听，才知道大汽车先到营口练军营，正值该营李营长率大部士兵到田庄台演习，其余部分被日本兵缴械。然后分三路到营口县警察厅、渔业局等单位放置步哨，检查行人。约8点多钟日军到营口县政府（当时营口未设市）集会，召开县内各机关首长会议，到会的有营口县县长杨晋源、警察厅厅长白铭镇、渔业局局长李安人等。日本人宣布，各单位要各安职守，不许妄动，听候分配。散会后，将县长杨晋源、翻译孙金波带到新市街日本地方事务所去开会，这是第一天的情况。由此以后每天早7点钟即看见杨晋源和孙翻译坐小汽车到新市街去报告县内每日应行事宜，讨论营口县内各单位的人事问题。可见当时营口县内行政权是属于谁了。如此经过十几天后，营口县即行改组，除县长杨晋源照常留职外，另派日本人左川为参事会议长，还有日本人参事二人（都是新市街日本商人）。该参事长期驻县政府，掌握县内行政事宜。县内设有四局一科。

其他附属机关均设有日本人指导员一人至二人，唯警察局派有指导员五六名之多。各分局都派有日本人指导，这是事变后营口县政府机构的情况。

（摘自《营口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九·一八”在安东

林懋功

1931年9月18日夜11时许，侍者传来安东县政府电话，召开紧急会议。我（时任安东县教育局科长）立刻起床，趋步到

县府（今县前街利民商场），出席的主要人员有：县财务局长于麟炳、县公安局长王颖、县教育局长李绍芳、市公安局代局长张汉威、鸭浑两江水上公安局长栾云奎、安东总商会长孙荣明、总商会理事袁华东、安市肥料公司经理张学礼、木业公会会长白××、县总务科长兼外交科长黄福元、县财务局科长林铭绶等，约20人。

当我甫始入座，县长王介公向众宣告：“刻间，日本领事来县告我，日本关东军业于晚10时占领省城（沈阳），安东驻军刻下也要进入中国市街，我和你以私人关系，先来通知你。你的意见怎样？”我答：“以安东地方人民不流血为原则。”领事说：“我也是这样看法。”我说：“容我考虑一下，再通知与你。”领事说：“现在已进入军事时期，我是无能为力的。”说着就告辞了。

此刻，全场人士，精神紧张起来，互相扫视。市公安局代局长张汉威，怒气冲冲，首先发言：“我公安局500来人，豁上和他拚一下。”其次是总商会长孙荣明和理事袁华东发言：“安东尽是商民，一旦发生冲突，胜败姑且不论，眼前损失，即不堪设想。”另一些人，则一旁推测：沈阳驻有重兵，日本是否敢冒险？有的则说，安东虹桥交涉^①，是一实例，你若敢干，他就老实了……。

县长王介公的主张是：事关大局，不是一个县所能解决的。暂保安东之安全，静观大局。几百警察，无济于事，徒自牺牲，于事无补。

正在议论中，外面传来日本军队已经开来，大门外架设机

^① 虹桥交涉：虹桥今头道桥。1926年5月，为反对日帝强修虹桥，安市2万多市民举行示威，推出各界代表22人进行交涉，迫使日帝不得不仍在原址，并由中日两方共同修筑。

枪，卫队缴械啦。县长慌忙带同黄科长前去应付。此外，市公安局代局长张汉威、县公安局长王颖、水上公安局长栾云奎、商会会长同理事等都从县政府后院，逾墙而走。教育局长李绍芳，他是国民党员，没等王县长的话说完，早已悄悄地溜走了，中途被日本宪兵队接去了。

时已19日凌晨3时矣，县政府内外，断绝出入。日本军人，气势汹汹，控制门口。黎明7时许，经县长交涉，由县政府派专员在大门口守候，认定是县职员，准予出入。

我回到教育局，首先掩藏秘密文件。一年来，省、县屡次下达文件，日本企图行动的指示。8时许，日本警察署的一名特务（朝鲜人）来局见我。问李局长的去向。接之，交出一份名单，上列各校长、教员的名字约三四十人，让我逐一作出鉴定：亲日，排日。我当时的答复是：各校长、教员，平日安心教学，既无亲日之表现，亦无排日之行动。一时难于判定，容我详细考察一下，再行告你。继之，日本宪兵、刑事、特务，此彼来去，观察情况，不一而足。

19日早8时，日本宪兵队长加藤，全副武装，乘坐吉普车，杀气腾腾，入驻县政府大客厅。同时，安上军用电话，发号施令。

日本士兵在中国电报局门口站着双岗。中国银行、东三省官报号、税捐局都由日本设岗把守。商号门半掩着，人们互相窃窃私语。只有小贩，如卖豆腐脑的，卖麻花烧饼的，照旧做生意。

从二道桥通往县政府的街道上，异常忙碌。日人架设电线的，安装电话的，日本电灯厂安装日本电灯的，自来水公司、瓦斯公司，挖掘马路，安装水管、瓦斯管的……日本军车，架着机枪，日军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汽车响出刺耳的喇叭尖叫声，

沿街梭巡。

19日凌晨，市内武装部门，全部被日军缴械占领。朝鲜人老少妇孺，成群结队，涌来市内观看。

10时许，日人将中国电灯厂（大沙河沿东坎子）机器全部拆卸，斯夜一片漆黑。

9月19日夜晚10时许，听有远处响起枪声。正在人心恐慌之时，以为朝鲜人又要过来了。及到天亮，传来消息，九道沟的宏聚永丝厂工人，为求安全（预防朝鲜人）上房顶了望，持木棒铁器等，被日军巡逻队发现，开枪射击，9名无辜工人被枪杀。20日，日本报纸发表号外，并附照片，诬为“持械反抗者”、“皇军又一胜利”云云。

从20日晨起，沿街见到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安民布告。内容大意：东北三省人民受军阀压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皇军本人道主义，除暴安良，驱逐张学良。大军所至，秋毫不犯，鸡犬不惊，各安生业，勿自惶恐云云。

为了稳住人心，王县长与日本宪兵队长加藤核商，打开中国银行的金库，发给公务人员9、10两个月的薪俸，公务员心情安定下来，22日，学校照常上课。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辽宁省教育厅便函，通知派专员去省具领重要文件（以前报省各教职员履历证件，审核入党资格）。同时收到锦州辽宁省政府教育厅训令：日本侵占东北，业经提交国联，听候解决，不得擅离职守，一切文件，呈锦州省政府。此后，再无文件往来。

徐铁珊入安东县政府，是安东县的一大转折。徐铁珊，名肅，浙江绍兴人，汉文饱学之士，精通日语，口齿伶俐，为日人所赏识。曾在七道沟日本租界地内包办市场，人称徐总办。后任东边道交涉署外交科长。徐进入安东县政府后，始为顾问，常

以代表县长身份，出头露面。嗣后，竟成安东县政府的决策人。徐入县后，对于日本国策，熟览胸中，卖力实行。徐吸食鸦片，在客厅里陈设烟具，来访的要人，可以自由吸食。徐是整天一榻横陈，喷云吐雾。

约一个多月后，县政府改组为安东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下设六大处：总务处、财务处、教育处、警务处、水警处、实业处。原县长王介公任总务处长，徐铁珊任财务处长，原凤城驻军陆军第七团团长姜全我任警务处长，栾云奎为水警处长，王介公兼教育处长，实行处长一时无妥人，暂缺。原县总务科长兼外交科长黄福元，是县长王介公的翻译，与处长享受同等待遇。

11月1日，“安东县地方治安维持会”在县政府客厅举行成立典礼，参加人员县属各科、处、局长以上及市内机关法团首领约50人。由王县长致开幕词，日本宪兵队长加藤致贺词，内容是漫骂张学良，日本皇军是吊民伐罪，最后由徐铁珊领呼：“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万岁”三唱。会后设宴席五桌（鸭江春）。在此情况下，饱尝亡国滋味，暗自悲伤。中国人除少数几个外，大都面色阴沉，举箸难咽。便衣特宪，横眉扫视。

安东县地方治安维持会建立，即缴销安东县政府旧印，由中央政府颁发的铜质县印，截角作废。从此，安东沦为日寇铁蹄之下，受尽凌辱，历尽灾难。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一辑）